

关于《宋诗钞》编纂的两个问题

巩本栋

(南京大学 文学院,江苏 南京 210023)

摘要:《宋诗钞》是一部比较全面地反映宋诗面貌的清一代最为重要的大型宋诗选本。晚明潘是仁所编《宋元诗集》对《宋诗钞》有直接影响。明末清初江浙藏书之风很盛,黄宗羲、吕留良、吴之振等皆致力于宋集的搜集,这也从文献上为《宋诗钞》的编纂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准备。

关键词:《宋元诗集》;《宋诗钞》;清初;江浙;藏书

中图分类号:I207.227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673-9841(2015)01-0130-08

在颇经历了一番世态炎凉之后,宋诗至清初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,其诗学史地位的认定也终于出现转机。作为这种关注和转机的重要标志,便是大型宋诗选本《宋诗钞》的编纂和流传。

关于《宋诗钞》的编纂及其相关问题,钱锺书先生曾有所论述^[1],近年来学界关注渐多,并取得了不少成绩^①,然而,仍存在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。本文主要从文献学角度,对晚明潘是仁所编《宋元诗集》与明末清初江浙藏书之风对《宋诗钞》编纂的影响等问题试作探讨。

一、晚明潘是仁所编《宋元诗集》及其与《宋诗钞》的关系

明人所编宋诗选本,据申屠青松和谢海林博士的考订,知有十数种^{[2][3]},然其大半已亡佚,今可见者主要有明隆庆间李褰所编《宋艺圃集》、潘是仁编《宋元诗集》、曹学佺编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的宋诗部分、符观编《宋诗正体》和卢世澂《宋人近体分韵诗钞》(残)五种。后二书只选近体,篇幅既小,流传不广,可以不论。前三种则对《宋诗钞》的编纂有较直接的影响。申屠青松曾指出诸书编选宋诗的主要特点是以唐存宋,同时也分析了其文献价值。其后,王友胜撰《论〈宋艺圃集〉的文献价值与文献阙失》^[4],许建昆撰《曹学佺〈石仓十二代诗选〉再探》^[5],分别对李褰《宋艺圃集》和曹学佺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两书,从文献学角度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。然而,对潘是仁所编《宋元诗集》一书及其对《宋诗钞》的影响,尚未予以应有的注意。

潘是仁字切叔,新安(今深圳宝安)人,主要生活于明神宗万历时期,卒于明熹宗天启二年

^① 比如张仲谋先生所撰《清代文化与浙派诗》一书,便指出在《宋诗钞》的编纂过程中,黄宗羲和吕留良皆曾参与,而吕留良“出力为最多”(《清代文化与浙派诗》,北京:东方出版社,1997年,93页),这是很有见地的。蒋寅先生在其《〈宋诗钞〉编纂经过及其诗学史意义》一文中将是书置于清初诗学背景下加以考察,进一步指出吕留良在编纂活动中所起的核心作用,并对吴之振的诗学观念、《宋诗钞》编纂的得失及其诗学史意义等问题,进行了深入的探讨(文载《清代文学研究集刊》第2辑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9年,242-259页)。申屠青松博士撰有《〈宋诗钞〉与清代诗学》一文,对《宋诗钞》中所体现的宋诗观和对清代诗学文献的影响(文载《暨南学报》2010年第5期,82-86页),也进行了很好的论述。

收稿日期:2014-11-16

作者简介:巩本栋,文学博士,南京大学文学院,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

基金项目: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“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”(10&ZD130),首席专家:程章灿;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(PAPD);南京大学“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协同创新中心”资助项目;南京大学985工程项目经费资助项目。

(1622)。关于他的生平行事，只知道他与焦竑、顾起元、袁中道、李维桢、胡应麟等一时名流有交往，余则不详。《宋元诗(集)》273卷^①，为潘是仁晚年所编，时当明神宗万历后期。在潘氏生前，此书的北宋、南宋和元初三部分应已编成，计收入两宋诗人26家135卷、金朝诗人1家10卷、元初诗人15家63卷，遂有万历四十三年潘氏刊本。书中元末部分，潘氏生前未编成，他去世后，由其生前委托友人鲍山在潘氏原书基础上续编而成，鲍氏增元末诗人19家65卷，故又有天启二年重刊本。

关于《宋元诗集》的编纂宗旨和指导思想，潘是仁并没有明确说明。他在编纂过程中曾征求过多人意见，并请多人为此书作序。虽然此书的编纂以潘是仁为主，然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晚明士人集体编纂的成果，反映的是晚明士人对宋诗的共同看法，从中不难看出其编纂的宗旨。据书集前所列“汇定宋元名公诗集姓氏”，前后参与是书编订者竟有数十人之多。其中李维桢、焦竑、汤宾尹、顾起元、冯时可、董其昌、李日华、邹迪光、祁承爚、黄景星、钟惺、袁中道、谭元春等，皆为当时文坛显人，且李维桢、焦竑、鲍山等还为此书写过序。李维桢《宋元诗序》说：“顷日二三大大家王元美、李子田、胡元瑞、袁中郎诸君以为，有一代之才即有一代之诗，何可废也。稍为摘取评目，而友人潘切叔益搜葺世所不甚传者百余家。”^{[6]卷首}其中提到“后七子”中的王世贞、“末五子”中的胡应麟(李维桢自己也是“末五子”之一)、“公安派”主将袁宏道和编纂《宋艺圃集》的李蓑。这些人虽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复古派的影响，于诗尊崇汉魏盛唐，但他们论诗既前后有变化，与前七子一味拟古的做法有所不同，对宋诗的态度也不同。

像身为“后七子”领袖人物的王世贞，与李攀龙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。他在复古的同时又主张融合古今、融合秦汉与唐宋。他曾提出“用宋”的观点，他说：“当吾之少壮时，与于鳞习为古文辞，其于四家(指宋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、苏轼)殊不能相入。晚而稍安习之。毋论苏公文，即其诗号为雅变杂揉者，虽不能为吾式，而亦足为吾用。其感赴节义，陪明之所，溢散而为风调才技，于余心时有当焉。”^{[7]卷四十二《苏长公外纪序》，p558}在为杨慎《宋诗选》所作的序言中，他又说：“自杨、刘作而有西昆体，永叔、圣俞思以淡易裁之，鲁直出而有江西派，眉山睥睨其间，最号为雄豪，而不能无利钝。南渡后，务观、万里辈亦彬彬矣。(略)余所以抑宋者为惜格也，然而代不能废人，人不能废篇，篇不能废句，盖不止前数公而已。(略)虽然，以彼为我则可，以我为彼则不可。子正非求为伸宋者也，将为善用宋者也。”^{[7]卷四十一《宋诗选序》，p549}他不再拘执于时代古今，对宋诗采取部分肯定的态度。

再如袁宏道，他反对七子派的一味拟古，主张诗以真为贵，认为：“唐自有诗也，不必‘选体’也。(略)赵宋亦然。陈、欧、苏、黄诸人，有一字袭唐者乎？又有一字相袭者乎？”^{[8]卷六《与丘长孺》，p284}又自谓：“近日始遍阅宋人诗文。宋人诗，长于格而短于韵，而其为文，密于持论而疏于用裁。然其中实有超秦汉而绝盛唐者。”^{[8]卷二十一《答陶石簪》，p743}“韩柳、元白、欧，诗之圣也；苏，诗之神也。彼谓宋不如唐者，观场之见耳，岂直真知诗何物哉？”^{[8]卷二十一《与李龙湖》，p750}“放翁诗，弟所甚爱，但阔大处不如欧、苏耳。近读陈同甫集，气魄豪荡，明允之亚。周美成诗文亦可人。”^{[8]卷二十二《答陶石簪》，p778}“大概情至之语，自能感人，是谓真诗，可传也。”^{[8]卷四《叙小修诗》，p188}这比王世贞对宋诗的评价更进一步，虽然主要针对复古派而说，但至少他认为一代有一代之诗，宋诗不必不如唐。

李维桢以“事、理、情、景”论诗，认为唐诗之妙在于情真、事实：“宋元道宋元事，即不敢望《雅》、《颂》，于十五《国风》者，宁无一二合耶？”所以，他不但引据王世贞、袁宏道等人“有一代之才即有一代之诗”的观点，而且更具体地论道：“宋诗有宋风，元诗有元风，采风陈诗，而政事学术，好尚习俗，升降污隆，具在目前。故行宋元诗者，亦孔子录十五《国风》之指也。闻之诗家云：宋人多舛，颇能纵横；元人多差醇，觉伤局促。然而宋之苍老，元之秀俊；宋之好创造，元之善模拟，两者又何可废也。”^{[6]卷首}元诗此可不论，李维桢对宋诗的认识，比起同时代的其他人来说显然要客观得多。焦竑

^① 是书书名颇为参差，或作《宋元诗》，或作《宋元诗集》，因书前有“汇定宋元名公诗集姓氏”、“北宋诸名公姓氏”等，又作《汇定宋元名公诗集》，今统一作《宋元诗集》。

《汇定宋元诗集序》亦曾引述顾大猷语“一代有一代之诗”的看法，并谓：“新安潘君诩叔所收二代诸名家甚多，至是择而梓之，令学者知味道取成乎心，寄妍于物，含茹万象，融会一家，譬之桔梗豨苓，时而为帝，何为不可？（略）然则发今人欲悟之机，回百年已废之学，其在斯人也夫。”^[6]卷首 这与李维桢、袁宏道等人所论一致。

潘是仁《宋元诗集》的编纂，正是在晚明士人这种反对盲目拟古、主张“一代有一代之诗”的总体认识和特定背景下进行的，也就是说，其编纂宗旨和指导思想并不是要证明宋诗超过了唐诗，而是要对前后七子以来一味拟古的文坛风尚进行反拨，指出宋诗自有其可取之处。尽管如此，此书编纂于明复古派尊唐黜宋之后，正如焦竑所说，对于“回百年已废之学”，重新确立宋诗在诗史发展中的地位，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。黄宗羲论诗谓：“诗不当以时代而论，宋、元各有优长，岂宜沟而出诸外若异域然。即唐之时，亦非无蹈常袭故充其肤廓而神理蔑如者，故当辨其真与伪耳。徒以声调之似而优之而劣之，扬子云所言伏其几、袭其裳而称仲尼者也。此固先民之论，非余臆说，听者不察，因余之言，遂言宋优于唐。夫宋诗之佳，亦谓其能唐耳，非谓舍唐之外能自为宋也。于是缙绅先生间谓余主张宋诗。噫，亦冤矣。”^[9]《南雷诗文集》上《张心友诗序》，p50 又谓：“天下皆知宗唐诗，余以为善学唐者唯宋。”^[9]《南雷诗文集》上《姜山启彭山诗稿序》，p60 并对学唐而有成就的宋诗派别一一列举。吕留良、吴之振在《宋诗钞序》中更明确地指出：“宋人之诗，变化于唐，而出其所自得，皮毛落尽，精神独存。不知者或以为‘腐’，后人无识，倦于讲求，喜其说之省事，而地位高也，则群奉‘腐’之一字，以废全宋之诗。故今之黜宋者，皆未见宋诗者也。”此书的编纂，“非尊宋于唐也，欲天下黜宋者得见宋之为宋如此”^[10]卷首，p3-4 ①。诸人所论，正是接着晚明公安派和《宋元诗集》编纂者“一代有一代之诗”的话题说的，他们的看法与晚明士人对宋诗的反省和认识一脉相承^②。

在《宋元诗集》书前所列的“汇定宋元名公诗集姓氏”中，竟陵派主将钟惺、谭元春的名字也赫然在目，这很值得注意。钟惺、谭元春论诗，出入“公安”而自立一宗。钟惺称：“诗，清物也。其体好逸，劳则否；其地喜净，秽则否；其境取幽，杂则否；其味宜澹，沉则否；其游止贵旷，拘则否。之数者，独其心乎哉？（略）索居自全，挫名用晦，虚心直躬，可以适己，可以行世，可以垂文。何必浮沉周旋而后无失哉。”^[11]卷十七《简远堂近诗序》，p249-250 谭元春曰：“夫真有性灵之言，常浮出纸上，决不与众言伍。而自出眼光之人，专其力，壹其思，以达于古人，觉古人亦有炯炯双眸从纸上还瞩人，想亦非苟然而已。”^[12]卷二十二《诗归序》，p594 以清、以适己、以性灵论诗，别创深幽孤峭一派。这种对深幽孤峭的审美追求，表现在钟惺和谭元春对待学古的态度上（如编选《诗归》），便是要求古人之真诗，或曰求古人精神之所在。钟惺说：“惺与同邑谭子元春忧之，内省诸心，不敢先有所谓学古不学古者，而第求古人真诗所在。真诗者，精神所为也。”^[11]卷十六《诗归序》，p236 怎样才能求得古人的真诗呢？钟惺又说：“侧闻近时君子有教人反古者，又有笑人泥古者，皆不求诸己，而皆舍所学以从之。庚戌以后，乃始平气静心，虚怀独往，外不敢用先人之言，而内自废其中拒之私，务求古人精神所在。”^[11]卷十七《隐秀轩集自序》，p259-260 那就是要将师心与师古结合起来，平心静气，虚怀独往，以己之心揣度古

① 《宋诗钞序》一般作吴之振撰，然康熙五十九年孙学颜编《吕晚村先生古文》题下注“代”，似已作吕留良撰。下僧慧《吕留良年谱长编》（中华书局，2003年，191页）作吕氏之作。蒋寅亦赞同此说（参其《〈宋诗钞〉编纂经过及其诗学史意义》，文载《清代文学研究集刊》第2辑）。申屠青松以雍正三年天盖楼吕氏家刻《吕晚村先生文集》未收此文，维持吴撰之说（《清初宋诗选本研究》，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2008年，82页）。然观吕留良《答张菊人书》所云：“自来喜读宋人书（略），因与孟举叔侄购求选刊以发其端，以破天下‘宋腐’之说之谬，庶几因此而求宋人之全。”（《吕晚村先生文集》卷一，《吕留良诗文集》上册，30页）又《吕晚村先生论文汇钞》曰：“有用古文极熟套头语，而能化腐臭为神奇者，所争在气脉，不在皮毛也。”（《吕留良诗文集》上册，472页）与序中语颇似。因此，此序作吕、吴二人所撰，或更符合实际。

② 其中尚有钱谦益的推动作用。钱谦益诗学受程嘉燧影响，由学唐而兼学宋，对公安派的性灵说亦有所取。黄宗羲受其影响而又有所发展。吕留良和吴之振则在不同程度上受黄宗羲诗学的影响。其间的关系，可参孙之梅《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》（齐鲁书社，1996年）、吴宏一《清代诗学初探》（牧童出版社，1977年）、张健《清代诗学研究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9年）、蒋寅《清代诗学史》第一卷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2年）等有关章节。

人之心,使古人的心灵和精神与己心相遇合,如此所得便是真诗。焦竑《宋元诗集序》称潘氏此书,可“令学者知诗道取成乎心,寄妍于物,含茹万象,融会一家。(略)不然,尧行禹趋,而不知心之精神为圣人所重,为西人(按此指利玛窦)笑耳。”^[6]卷首 这同样是从求古人真诗或精神的意义上立论的。潘是仁在所选诗集的题识中批评复古派曰:“嘉、隆诸公黜宋音于唐,譬解佩带之垂罗,而悉命被深衣之板摺,不第昧乎诗,抑且乖乎人情矣。”^[6]《秦少游诗集题识》又谓:“诗贵得情。故有苦心雕琢,而读之毫不令人兴起;有矢口而出,而隽永之味反津津不竭者,在情不在学也。”^[6]《雪岩诗集题识》论诗贵情,反对一味模拟古人,这与前引袁宏道所谓“大概情至之语,自能感人,是谓真诗,可传也”,与钟惺、谭元春、焦竑的任诸己、重性灵、求真诗的看法也是相吻合的,反映的是晚明公安派、竟陵派的文学观念。吕留良虽对竟陵派等人略有微词^①,然其编纂《宋诗钞》却仍受到公安派和竟陵派以及《宋元诗集》的影响。观吕留良、吴之振在《宋诗钞序》中的著名判断:“宋人之诗,变化于唐,而出其所自得,皮毛落尽,精神独存。”^[10]卷首·p3 在介绍是书的编选体例时说:“是选于一代之中,各家俱收;一家之中,各法具在。不著圈点,不下批评,使学者读之而自得其性之所近,则真诗出矣。”^[10]卷首《凡例》, p5-6 吕留良为《东坡诗钞》作小传说:“读苏诗者,汰梅溪之注,并汰其过于丰缛者,然后有真苏诗也。”^[10]628 《安阳集钞》小传称:“(韩琦)诗率臆得之,而意思深长,有锻炼所不及。理趣流露,皆贤相识度。其《题刘御药画册》语云:‘观画之术,维逼真而已。得真之全者绝也,得多者上也,非真即下矣。’人谓此术不独观画,即可观人物。窃谓惟诗亦然。”^[10]99 又在戴昺《农歌集钞》小传中引戴昺诗《答妄论宋唐诗体》云:“安用雕镂呕肺肠,辞能达意即文章。性情元自无今古,格调何须辨宋唐。人道凤箫谐律吕,谁知牛铎有宫商。少陵甘作村夫子,不害光芒万丈长。”并谓“知此,可与言诗矣”^[10]2758。以上皆足以以为证,只是吕、吴所谓“真诗”的理论内涵更为丰富而已。

钟惺、谭元春编选《诗归》提出“虽选古人诗,实自著一书”^[11]卷二十八《与蔡敬夫书》, p469, “彼取我删,彼删我取”^[12]卷二十七《奏记蔡清完公前后笺札》其四, p758, 反复斟酌。“每于古今诗文,喜拈其不著名而最少者,常有一种别趣奇理,不堕作家气。”^[13]卷十六《王季友诗钟惺总评》, p282 黜落名篇,标榜奇趣,反映出选家强烈的主观意识。《诗归》在当时影响很大,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。潘是仁既与钟惺有交往,钟、谭二位又参与过《宋元诗集》的编纂(《诗归》与此书编纂约略同时),潘氏自不免受到钟惺影响。从李维桢所称“益蒐葺世所不甚传者百余家”云云,不难看出这种影响的痕迹。《宋元诗集》所选两宋诗人 26 家,像梅尧臣、苏舜钦、王安石、苏轼、黄庭坚、杨万里、范成大等这样的大家名家皆不入选,而像米芾、蔡襄、文同、王十朋、葛长庚、赵抃、裘万顷、宋伯仁、戴昺、真山民等这些未必以诗名世的人物却被选入集中。潘是仁这样做是否也像钟惺那样是为了追求“别趣奇理”呢,我们虽尚难断言,但在编选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意识或个人色彩,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潘是仁曾在所选的 13 种宋人诗集前作过题识(占所选诗人的二分之一)。我们看他称唐庚为“偃息衡门,棲心流水,取一丘一壑以自足者也,心窃慕之”^[6]《唐眉山诗集小引》;谓秦观“中年老于迁徙,多江湖节烈之风,无夜雨牢骚之气”^[6]《秦少游诗集序》;谓王十朋“被愆所黜,遂辟小园,日涉吟咏,悠悠自乐。其所咏诗篇《自宽集》,因篝灯校讎,知晋宋人不堪殊轍如此”^[6]《王梅溪诗集序》;称葛长庚诗“真若肺腑有烟霞,喉舌有冰雪”^[6]《白玉蟾诗集序》;称真山民“高襟远韵,具见是帙,自幽寻雅赏之外,绝不作江湖酬应语”^[6]《真山民诗集序》;将林逋诗置于卷首,请王应翼题识,尊之为“才仙”;以上皆足以见出其超然脱俗、高自标置、怀幽慕远的胸襟(由此亦可推测其或一生不曾入仕),尤其是他称道真山民的话,与钟惺所云“夫日取不欲闻之语,不欲见之事,不欲与之人,而以孤衷峭性勉强应酬,使吾耳目形骸为之用,而欲其性情渊夷,神明恬寂,作比兴风雅之言,其趣不已

① 案吴之振曾自道初亦学竟陵派诗,后则转学盛唐,学苏、黄(参其《晚树楼诗稿序》,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康熙刻本,齐鲁书社,1997年,集部第252册,131页)。关于竟陵派在清初诗坛的遭遇和影响的消长,可参陈广宏《竟陵派研究》一书《结语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,2006年,478-499页;蒋寅《清代诗学史》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,91-98页。然而,通过本文的研究可知,虽然竟陵派在清初受到批评甚多,然在清初诗坛的影响依然存在。

远乎？”^[11]卷十七《简远堂近诗序》，p249-250 如出一辙。再从具体作品的编选来看，像陆游的诗，他选编了6卷，数量并不算少，然这些作品多题咏山水景物，吟咏生活放逸之趣，而少有抒发忧心恢复、忧心国家社稷的作品。潘是仁欣赏的是“处逆境不为所颠倒，反藉诗文为鼓吹，其襟趣自足千古”^[6]《陆放翁诗集序》。这种带有较大主观性的选择，我们当然不能认为这就是陆游诗歌的主要面貌。

《宋诗钞》的编选，虽不能说是追求“别趣奇理”，然而在具体的编纂过程和小传的撰写中，却一定程度上受到了《宋元诗集》的影响。比如在编选倾向上，翁方纲批评《宋诗钞》“实有过于偏枯处”^[14]卷四，p110，批评时人以“吟咏性灵、掉弄虚机者为宋诗”^[14]卷四，p123，并举《宋诗钞》为例，虽不无夸大，然多少也是看出了吕、吴在编选中表现出的较强的主观色彩，适可为受《宋元诗集》影响之一证。再看选目，《宋元诗集》所选26位宋代诗人，除了蔡襄、曾几和王十朋3位，其他23位诗人全部入选《宋诗钞》（就中有标目而无诗者，更说明其选目受到过《宋元诗集》的影响）。其中很多人诗作并不多，诗名也未必大，能入选集中，似应有《宋元诗集》的影响。还比如《宋诗钞》所选诗人小传中的一些评语，也来自潘是仁的题识。前引潘是仁对真山民其人其诗的评论，就为吕留良所采纳。他说：“真山民，不传名字，亦不知何许人也，但自呼山民云。李生乔叹以为不愧乃祖文忠西山，以是知其姓真矣。痛值乱亡，深自湮没，世无得而称焉，惟所至好题咏，因流传人间。然皆探幽赏胜之作，未尝有江湖酬应语也。”^[10]2919 潘是仁题陈与义诗集，曾引刘辰翁“诗道如花。论高品则色不如香，论逼真则香不如色”^[15]卷十五《简斋诗集序》，p440 的话，吕留良《简斋诗钞》前小传亦引此语，也未必是巧合。

吕留良、吴之振在编纂《宋诗钞》时可资利用的宋诗总集，主要有《宋文鉴》《宋艺圃集》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（宋代部分）和《宋元诗集》。然而他们对前三种书并不满意，认为《宋文鉴》所选诗歌太少，《宋艺圃集》“漫无足观”，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所录作品亦少。而《宋元诗集》“虽去取未精，然每集所存较多”^[10]《凡例》，p5，故基本予以肯定。其实，《宋诗钞》不但在编选内容上直接使用了《宋元诗集》中的材料^①，而且在编选体例上也完全承袭了《宋元诗集》，即所选诗人大致以时代先后为序^②，人各一集，僧人、女性诗人附于后，每集多据别集钞录，先五七言古体，再五七言律绝近体。《宋元诗集》所选部分诗集前有编者题识，略似小传；《宋诗钞》则扩而大之，每集前有小传。这都可见出《宋元诗集》对《宋诗钞》编纂的影响。

二、明末清初江浙藏书之风与《宋诗钞》的编纂

明末清初江浙地区藏书之风很盛，许多著名藏书家很注意收藏和传抄宋元人文集^③。像明末的谢肇淛、李开先、祁承煜、毛晋等，都具有强烈的保存前代文献的意识，并收藏过很多宋元人文集。明人对宋元人别集的保存和刊刻，对清初士人有着直接影响。比如清初金陵藏书家黄虞稷就是一位有意识保存宋元文集的士人，他曾征刻唐宋秘本书，清康熙年间参与修纂《明史》，撰成《明史·艺文志》稿本，后来刊为《千顷堂书目》，其所编书目虽以录存有明一代文献为主，然而却于集部别集类之后补录宋金元人别集，足以见其取向。其中所补录的宋人别集总数达240种之多（包括少量卷帙有残缺的别集）^④，其数量相当可观。又如秀水曹溶，保存宋集的意识就更为明确，他在为钱谦益《绛云楼书目》所作的题词中说：“予又念古人诗文集至夥，其原本首尾完善通行至今者，不过十二三。自宋迄元，其名著集佚者，及今不为搜罗，将遂灭没可惜。故每从他书中随所见剔出，补缀成编，以存大概。如孙明复、刘原父、范蜀公等，颇可观。宗伯地下闻之，必以为寒乞可笑，然使人尽此

① 如申屠青松指出，《宋诗钞》中的《四灵诗钞》、《真山民诗钞》和《花蕊夫人诗钞》等，皆直接取自《宋元诗集》，参其所撰《明代宋诗选本论略》，载《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》2007年第4期。

② 当然，《宋元诗集》编排顺序并不严格，时代晚而居前者亦有。这一缺点，也被《宋诗钞》所承袭。

③ 张仲谋曾指出，浙江地区的藏书、刻书，是《宋诗钞》编纂和浙派赖以形成的文献基础，这是很正确的，然惜未深论，且只注意到浙江地区。参其所撰《清代文化与浙派诗》，27-28页。

④ 如加上单行的宋人奏议集14种，则总数已至254种。另补宋人总集36种、诗文评17种，别集总集的数量共计达307种。

心,古籍不亡,自今日始矣。”^[16]卷首《绛云楼书目题辞》, p322上 曹溶所收藏、抄录的宋元人别集数量很大。据王士禛记载:“秀水曹侍郎秋岳溶,好收宋元人文集,尝见其《静惕堂书目》所载宋集,自柳开《河东集》已下,凡一百八十家;元集自耶律楚材《湛然集》已下,凡一百十有五家,可谓富矣。”^[17]卷十六“宋元人集目”条, p386 据近人叶德辉统计,《静惕堂书目》中宋集数量达196家,金元人别集的数量也多至139家。叶德辉指出:“乾隆时修《四库全书》,此目所载十九著录,斯固两朝文人精爽之所凭依,故得长留天地间也。”^[18]卷首,《静惕堂书目序》, p3 由此可见曹溶对宋人别集在清代的传播和接受的贡献之大。

曹溶又曾撰《流通古书约》,认为藏书家不仅要保存书籍,还应互通有无,以抄为藏。他提出:“彼此藏书家,各就观目录,标出所缺者,先经注,次史逸,次文集,次杂说,视所著门类同,时代先后同,卷帙多寡同,约定有无相易,则主人自命门下之役,精工缮写,较对无误,一两月间,各贻所钞互换。此法有数善:好书不出户庭也,有功于古人也,己所藏日以富也,楚南燕北皆可行也。”^[19]曹溶的看法得到当时许多著名藏书家的响应,“昆山徐氏、四明范氏、金陵黄氏皆谓书流通而无藏匿不返之患,法最便”^[16]卷首《绛云楼书目题辞》, p322上。于是,书籍抄存一时蔚为风气,曹溶、黄虞稷、周在浚、黄宗羲、吴之振、朱彝尊、徐乾学、王士禛等都曾互相借阅传抄过很多书籍^[20]1318册, p55-56,其中所抄的宋人别集很多。王士禛就多次记载自己从黄虞稷、朱彝尊等处抄录宋集的情况,仅康熙二十八、二十九两年间(1689—1690),他在京城“借朱竹垞钞本宋元人集十数种”,并详记其中数种曰:“《谢皋羽年谱游录注》,山阴徐沁楚公撰,余姚黄宗羲太冲先有《西台恸哭记》《冬青引注》,徐注黄序之。”^[21]卷一, p318上 “宋陈泊亚之诗一卷,仅二十五首,有颜复长道序,司马文正公,文忠、文定二苏公,孙莘老,徐仲车及长乐林希,陈留张徽南,兰陵钱世雄,眉山李埴,皆跋其后。又嘉定丙子眉山任希夷题诗云:‘如彼流泉必有源,陈家诗律自专门,后山得法因盐铁,不减唐时杜审言。’亚之,师仲、师道之祖也。”^[21]卷一, p319上下 “叶石林《建康集》八卷,有嘉泰癸亥孙籥跋。二十代孙万跋云:‘秣陵焦氏本也,常熟毛氏尝得宋刻《建康集》,逸第三卷,当未见此。’按《石林全集》一百卷,桑民怿家书目有之,今不可得。此则绍兴八年再帅建康作也。石林,晁氏之甥,及与无咎、张文潜游,为诗文笔力雄厚,犹有苏门遗风,非南渡以下诸人可望。平生邃于《春秋》,集中《答王从一教授》二书可见其梗概。”^[21]卷一, p321上 “康熙己巳、庚午间,在京师,每从朱锡鬯、黄俞邨借书,得宋元人诗集数十家,就中以长沙陈泰志同为冠,因钞其《所安遗稿》一卷,以周弼伯弼《汶阳稿》、临江邓林性之《皇琴曲》、金华杜旃仲高《癖斋小集》附之。数子者名不甚著,而其诗实足名家。”^[22]卷五, p84 ①类似这样的传抄,不仅对宋集在清初的保存、传播与接受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,也促成了他本人中年时期诗风由唐转宋的演进^②。

清初士人搜藏、抄刻宋集的同时,往往编有藏书目录,这些目录虽多半比较简单,然其中或注明卷数、册数,或记其版本、序跋,已透露出不少有关宋集在清初传播的信息,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他们所撰写的一些藏书或抄刻之书的题跋,更为人们整理宋集提供了直接线索。比如,钱谦益曾藏有施元之、顾禧、施宿合撰的《注东坡先生诗》,其所撰跋语已指出,虽陆游的序题为嘉泰二年(1202),但实际上应“刻于嘉定六年”,并论其“考证人物,援据时事,视他注为可观”等特点^[23],就甚为确切。又,钱氏曾得明抄本汪元量《水云集》,撰两跋记之,指出其所收作品有逸出刘辰翁批点本《湖山类稿》者,稍后汪森取之与《湖山类稿》五卷相互参订,有增有损,由鲍廷博合刊之,遂广为流传。再如,王士禛撰宋集题跋数十条,其中记尹洙、穆修、柳开、郑侠、苏过等人集在清初的流传,记自己得黄庭

① 王氏以其他方式收藏的宋集尚多,即据今存《池北书目》,其所藏宋集就有90多种。

② 关于王士禛诗歌崇尚的变化与文坛风气、藏书等之间的关系等,请参蒋寅《王渔洋与康熙诗坛》第二章《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之消长》、第六章《王渔洋藏书与诗学的关系》,北京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1年,26-54、146-181页。

坚《山谷精华录》的经过,校尹洙《河南集》、谢薖《竹友集》等^①,都从多方面为人们整理宋集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。

《宋诗钞》编选的参与者黄宗羲和主要编纂人吕留良、吴之振等皆喜收藏、传抄宋人别集^②。黄宗羲收藏宋集不下百余种,其晚年在编选《明文海》的同时,又选编了《宋集略》《元集略》。他在给徐乾学的信中写道:“《宋元集略》尚未钞完,然亦不过旬日,即当送上也。只是未曾检出,及留在京邸者,不知何时得以寓目,弟初意欲分叙记各体,以类编纂,既而思之,以为不可。盖集中文字,亦未必皆佳,只据一集存其大概,使其人不至湮没,若类编之,则恶文盈目,反足为累。又未见之集极多,后来见之,又难于插上,不若一人自为一集,不论多少,随见随选,故名之曰《宋集略》、《元集略》。先生以为然否?弟架上亦有百余集,亦一概钞出,以请正也。”^[9]《南雷诗文集》(下)《与徐乾学书》, p68-69 在《与郑禹梅书》中他又提到,“《明文海》选成,亦一代之书。此外则有《宋集日抄》(又名《续宋文鉴》^③)、《元集日抄》。”^[9]《南雷诗文集》(下), p79 可见《宋集略》当时已大致编成,惜今已不传。他所依据的,正是其“架上百余集”的收藏。吕留良与吴之振所藏、所抄宋集亦多。吕留良曾从黄宗羲处借抄宋集^④,又客居友人黄虞稷、周在浚处专力抄录宋集^⑤,还向张菊人等借抄宋集^⑥。如此“爬罗缮买,积有卷帙,又得同志吴孟举互相收拾,目前略备”^[24]卷一《答张菊人书》, p29,从而在文献资料上为《宋诗钞》的编选作了较充分的准备。

宋人文集在清初流传既少,搜寻不易,因此,当黄宗羲、吕留良和吴之振等人在选编《宋诗钞》时,他们对宋集的网罗收藏,就成了他们所主要依据的文献。这在客观上为《宋诗钞》的编选提供了重要条件,如果没有他们平日的多方收藏,如果没有保存文献的意识,《宋诗钞》的编选在当时是很困难的,尤其是在明代以来宋诗备遭冷眼、宋集罕见流传的情况下^⑦。

宋人文集的传播在清初之所以会逐渐得到关注,从文学自身发展的线索来看,与清初文坛风气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。虽终明之世,文坛拟古之风甚盛,以秦汉文、盛唐诗为准的,宋人之诗文多遭厌弃,然至明中叶以后,唐宋派、公安派和竟陵派诸家兴起,情况亦渐有改变,及至明末清初,社会政治上的大变动以及文学自身的发展,都使得明代以来一味崇汉崇唐的习气难乎为继,而唐宋派之肤浅、竟陵派之幽深亦已难惬人意,宋人诗文遂又进入更多士人的视野。虽然其时人们心目中的宋诗

① 参《重辑渔洋书跋》,陈乃乾辑,《汲古阁书跋 重辑渔洋书跋》合刊本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5年,43-65页。

② 黄宗羲的诗学观念对吕留良、吴之振有重要影响,并参与过《宋诗钞》的编选。吕留良是《宋诗钞》编选的发起者、组织者和主要参与者,并撰写了诗人小传。吴之振、吴自牧则是主要参与和最后编定此书者。关于此书编纂的过程,详情请参钱锺书《谈艺录》“明清人师法宋诗”条(中华书局,1984年,143-145页)、张仲谋《清代文化与浙派诗》第二章第二节、申屠青松《清初宋诗选本研究》第三章第三节、蒋寅《〈宋诗钞〉编纂经过及其诗学史意义》等。

③ 全祖望谓:“于《明文案》外,又辑《续宋文鉴》、《元文抄》,以补吕、苏二家之阙,尚未成编而卒。”(全祖望撰、朱铸禹汇校集注《全祖望集汇校集注·鲒埼亭集》卷十一《梨洲先生神道碑文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0年,222-223页)

④ 吕留良《吕晚村先生文集》卷二《与黄太冲书》曰:“外明人选本及宋元明文集、《易象》二十本、《詹氏小辨》一本、《玫瑰集》三本,又《韩信同集》、《金华先民传》,俱望筒发。”(桐乡市吕留良研究会整理、徐正点校《吕留良诗文集》上册,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1年,39-40页)

⑤ 吕留良《答张菊人书》曰:“室中所藏多所未尽,孟浪泛游,实为斯事。至金陵,见黄俞部、周雪客二兄藏书,欣然借抄得未曾有者几二十家。行吟坐校,遂至忘归。忆出门时,柳始作绵,今又衰黄矣。”(《吕晚村先生文集》卷一,《吕留良诗文集》上册,30页)又,其《谕大火辟恶帖》亦谈到此事。曰:“吾所最快者,得黄俞部、周雪客两家书甚富,而恨不能尽抄耳。今寄归李伯纪《梁溪集》九本,可向曹翁翁处借福建刻本一对,无者方录出,亦可省些工夫。又,晁说之《嵩丘集》七本,书到即为分写校对,速将原本寄来还之。两家极珍惜,我私发归者,当体贴此意,勿迟误,勿亏损也。”(《吕晚村先生家训》卷三,《吕留良诗文集》下册,104页)

⑥ 吕留良《答张菊人书》曰:“又闻许示《茶山》、《紫微》、《斜川》诸集,梦中时乐道之。今读手教,更知其详。如《江西诗派》一书,某求之十余年而未得者也。承许秋后尽筒所蓄惠教,某何幸得此于执事哉。谨以所有书目呈记室,外此倘有所遇知,弗惜搜致之力也。”(《吕晚村先生文集》卷一,《吕留良诗文集》上册,30页)《寄吴孟举书》曰:“前札中云,梁姓者多藏书,许借《杨大年集》,今录上宋集目一纸,幸细问之,有可假者,亦快事也。”(《吕晚村先生文集》卷二,《吕留良诗文集》,74页)《寄黄太冲书》又曰:“近得《程北山集》六本,为宋纸印者。又钞得《诚斋集》一本,则旧本所未见。”(《吕晚村先生文集》卷二,《吕留良诗文集》上册,38页)皆是从他人借抄者。

⑦ 如宋荦说:“明自嘉、隆以后,称诗家皆讳言宋,至举以相誉警,故宋人诗集皮阁不行。”(《漫堂说诗》,《清诗话》本,丁福保辑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8年,上册,416页)

宋文内涵并不完全一致,然清初文坛的风气已发生变化,宋人文集得到了较多的关注,这是不用怀疑的^①。

从文学外部的环境来看,清初政治上实行高压政策,文字狱不断,凡涉明季事之书多禁之,这在客观上也使得士人们对前代文献的兴趣不得不转向宋元两代。比如朱彝尊在其《曝书亭著录序》中谈到自己藏书聚散的情况时说道,“明末战乱,昔日藏书,尽遭毁弃”,“及(顺治末)游岭表,归阅豫章书肆,买得五箱,藏之满一椟。既而客永嘉,时(康熙初)方起《明书》之狱,凡涉明季事者争相焚弃。比还,问曩所储书,则并椟亡之矣”^[20]卷三五《曝书亭著录序》, p55下,即透露出这一消息。

总之,《宋元诗集》的编纂与竟陵派有直接的关系,而这又影响了《宋诗钞》的编纂。明末清初江浙藏书之风很盛,黄宗羲、吕留良、吴之振等皆致力于宋集的搜集,这就从文献上为《宋诗钞》的编纂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准备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钱锺书. 谈艺录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4:143-145.
- [2] 申屠青松. 明代宋诗选本论略[J].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,2007(4):75-79.
- [3] 谢海林. 明代宋诗选本补录[G]//中国诗学:第14辑.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9.
- [4] 王友胜. 论《宋艺圃集》的文献价值与文献阙失[J]. 中国韵文学刊,2011(1):9-13.
- [5] 许建昆. 曹学佺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再探[J]. 励耘学刊:文学卷,2014:190-210.
- [6] 潘是仁. 宋元诗集[M]. 北京:国家图书馆藏明天启二年重刊本.
- [7] 王世贞. 弇州续稿[M].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. 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5.
- [8] 袁宏道. 袁宏道集笺校[M]. 钱伯城,笺校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.
- [9] 黄宗羲. 黄宗羲全集[M]. 吴光,主编. 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,2005.
- [10] 吕留良,吴之振,吴自牧,编选;管庭芬,蒋光熙,补. 宋诗钞[G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6.
- [11] 钟惺. 隐秀轩集[M]. 李先耕,崔重庆,标校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2.
- [12] 谭元春. 谭元春集[M]. 陈杏珍,标校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8.
- [13] 钟惺,谭元春. 唐诗归[G].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. 济南:齐鲁书社,1997.
- [14] 翁方纲. 石洲诗话[G]//谈龙录 石洲诗话. 陈迺冬,校点.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1.
- [15] 刘辰翁. 刘辰翁集[M]. 段大林,校点. 南昌:江西人民出版社,1987.
- [16] 曹溶. 绛云楼书目[M]. 续修四库全书本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.
- [17] 王士禛. 池北偶谈[M]. 勒斯仁,点校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2.
- [18] 叶德辉. 静惕堂书目[G]//林夕,主编. 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:明清卷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5.
- [19] 曹溶. 流通古书约[G]//澹生堂藏书约(外八种)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5:35-36.
- [20] 《曝书亭集》卷三五《曝书亭著录序》,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5.
- [21] 王士禛. 居易录[M].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. 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5.
- [22] 王士禛. 香祖笔记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2.
- [23] 钱谦益. 绛云楼题跋[M]. 潘景郑,辑校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5:110.
- [24] 吕留良. 吕留良诗文集[M]. 桐乡市吕留良研究会,整理;徐正,点校. 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1.

责任编辑 韩云波

^① 此点可参张仲谋《清代文化与浙派诗》第一章《宋诗的重新发现》、蒋寅《清代诗学史》第一卷第二章《拨乱反正的努力:江南诗学》等。